

文林廿八宿

師友風誼

林东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首子



宿八廿林文

師友風誼



林东海
著



首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友风谊/林东海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02-005982-9

I. 师… II. 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1531 号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李光敏 责任印制:王景林

师友风谊

Shi You Feng Yi

林东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9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5.5 插页 2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5982-9

定价 35.00 元



作者小传

林东海，福建南安人，1937年出生，先后就读于榕桥小学、南安一中、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入研究生班，在刘大杰教授指导下习研中古文学史，1965年毕业于，被分配到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下文化部静海干校三年，1972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十年代中曾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研究和注释古代诗文；八十年代初复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借调去考察唐代诗人李白游踪。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出版有《诗法举隅》、《古诗哲理》、《诗人李白》（日文版）、《太白游踪探胜》、《江河行揽胜诗草》等专著，以及《李白诗选》、《唐人律诗精华》等作品选注共二十多部（含合作与职务作品），发表其他诗文二百余篇。

责任编辑：岳洪治
装帧设计：康健

自序

在人生的旅途上，是离不开老师的指点和朋友的支持的，所以柳宗元《师友箴》有云：“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于是有所谓“学非一师，业传四远”之说。吾生也有幸，吾道也不孤，在苍茫尘海的跋涉中，我就得到许多师友的关照和帮助。回首前尘，脑海里留下不少难以磨灭的记忆，因摘录与前辈师友交往的若干琐事，叙而议之，既可以存师长垂海之风谊，也可以见文林声教之世范，幸莫以为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也。

我长期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在业务活动过程中，接触到众多的前辈作家和学者。潘岳《闲居赋》曰：“教无常师，道在则是。”选师择友，唯善是从，即古人之所谓“主善为师”（《尚书·咸有一德》）。这里所记宏道主善的前辈师长，凡二十八人，不必仿云台二十八将，但可拟黄道二十八宿，以其虽非天上星宿，却是前辈耆宿也。所记人物均以出生年月先后编次，最早者出生于1896年，最晚者出生于1926年，于今亦已届八十高龄矣。年齿相差三十岁，实涵盖前辈两代；第三代师友年在古稀上下，与我同辈，概不叙录，非杜少陵《壮游》诗之所谓“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盖欲留与后人忆说也。

凡所录者，类皆文林学界的大家与名家，或亦师亦友而颇深于情谊，或如切如磋而有益于学术，故叙其事，记其言，述其学，存其情，所记均为私交情况，是我心中留下的值得珍惜和回味的记忆，有些书信往来，向来未曾披露，因而阅读者可以从中看出这些

前辈耆宿平常行止的风范,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得到若干可资参考的资料。在记叙与前辈师友交往时,自然会带出本人的行迹与言论,在引述前辈来信时,也常夹带对不佞诗作与论著的谬加称赏,以明其劝勉之用心,实无意借此以自我表彰,亦无意藉托飞驰之势,以腾声名。年近古稀,于“名利”二字,业已参破,一切归于澹泊,幸勿以腐鼠滋味相猜也。

在叙事记言当中,或对历史背景补充说明,或对人物言行稍加议论,我不能如列子所说,对待师友“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列子·黄帝》),而是心直口快,坦然吐露。古人云,在官言官;俗话说,在商言商;我则是,在文言文,所记前辈尽是文人,自然所说所议,都限于文化学术。不管是说明,抑或是议论,都只表述我个人的一孔之见,自然有当有不当,有是有不是。凡所评述者,多数已作古,不能起其于九泉而对质,所幸读者自有明察,可以作独立判断,不至于盲从而误不当以为当,误不是以为是;有少数师友,今仍健在,然所记述文字,概未经其本人授意,亦未经其本人过目,存没一例,以示平等,在议论中倘有唐突之处,还望一如既往,多加点拨,匡我不逮。

先前曾撰写学林漫忆文章数篇,陆续刊载于《文汇读书周报》,据说读者反映不错,以为有“独得”之妙。人老了,总爱回忆往事。原拟待有闲暇,继续写点我所知道的前辈师友行迹。士光管兄提议,要写的都写出来,就由他任总编的人文社出版,谓可以保存一份史料。管兄之言不无道理,于是我便撇下其他工作,集中时间和精力,把要写的都写出来。所记林林总总,有松色,有竹韵,有梅香,谨为文林学界奉献一束岁朝清供。凡所交往前辈耆宿,大都如李义山诗所谓“平生风义兼师友”,又义通谊也,因总名之曰“师友风谊”。是为序。

丙戌夏至于清风馆 林东海

目 录	
自 序	1
乔松本性	
——记朱东润先生	1
音乐人生	
——记杨荫浏先生	21
大家风范	
——记俞平伯先生	33
护花使者	
——记冰心老人	45
仁者之风	
——记赵景深先生	58
精神富翁	
——记姜亮夫先生	70
人间怪杰	
——记聂绀弩先生	78
师德风规	
——记蒋天枢先生	89
文学的一生	
——记先师刘大杰先生	101
博综文史	
——记缪钺先生	130
长者之风	
——记余冠英先生	140
澹定人生	
——记吴组缃先生	152
躲进红楼	
——记吴恩裕先生	161

山高水长	
——记钱锺书先生	173
诗意人生	
——记林庚先生	177
师友风谊	
——记启功先生	194
中和情性	
——记陈迺冬先生	211
小溪流的歌	
——记严文井同志	223
冷眼热肠	
——记鲍正鹄先生	240
淡渍浓情	
——记郭汉城先生	257
红楼解味	
——记周汝昌先生	268
既明且哲	
——记陈祥耀先生	307
执着的追求	
——记蒋孔阳先生	325
夜莺飞去了	
——记诗人闻捷	337
受伤的鹰	
——记诗人牛汉	350
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	
——记诗人屠岸	364
逸气清风	
——记陈贻焯先生	379
德教光熙	
——记王运熙先生	389
后 记	402

乔松本性

——记朱东润先生*

为道与为学

“真奇怪，一个民族怎么会突然发神经！”

1975年12月，我出差上海，回到阔别八年的母校复旦，去第一宿舍六号探望朱东润先生。师生略叙别后简况，他便感慨地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问题，凝神注视着我。我一时没答上来，他接着说：“你说奇怪不奇怪，不过，我相信以后还会发神经的。”我点了点头，沉重地回答说：“这我相信。”可不，我回京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闹起来了。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师生俩未曾从历史的或哲学的角度探索这种怪现象，其实，彼此都有数，只是心照不宣。从我国的农耕历史和伦理哲学看，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渗透了“主奴”基因，“主奴”基因影响到民族性格，表现为惟命是从，崇拜权力，即所谓“官本位”。当权力系统紊乱，本位基础动摇，个人便会无所适从，社会便会失去平衡，也就“天下大乱”了。法治社会，个人可以有独立意识，社会可以用法制衡，不容易如中国“文革”

* 朱东润(1896.12.4.—1988.2.10.)，原名朱世溱，江苏泰兴人。早年曾留学英国，归国后执教于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专、江南大学、齐鲁大学。1949年后，长期任职于复旦大学。著作有《读诗四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陆游传》、《陆游选集》、《梅尧臣传》、《梅尧臣诗选》、《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李方舟传》、《朱东润自传》等。



朱东润先生

那样乱了套。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伦理观念的改变,“主奴”基因的引退,独立人格的产生,也许我们的民族不会再“发神经”了。

朱先生早年留学英伦,受过洋教育,其独立性格和自主意识自是不同于常人。在他耿直、执着乃至倔犟的性格中,不无传统文人狷介的个性,但同时也很有点西方现代人自主的意识,往往不为环境所左右。“文革”初期,他被打成“黑帮”,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但他从未

屈服。当时,我还在复旦,知道点运动的情况。我是1965年9月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上海市领导将当年毕业的文科研究生全部留下来,参加本校运动,揣其意,似乎是要这些研究生留下来写批判文章。照理,“文革”矛头所指,乃是“党内走资派”,上海却大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权力系统紊乱)。像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老教授遭到无妄之灾。我亲眼看到苏步青校长为首的“反动权威”列成队,胸前挂着写上“黑帮”的大木牌,肩上扛着劳动工具,从图书馆门前走过,朱东润师也在其中。看着这些古稀上下的老教授被折腾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无可奈何。朱师的罪名是“反共”,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听说他在四十年代写过所谓“反共”文章,就是那篇登在《观察》第六期上的报道《我从泰兴来》,写他1946年7月回乡的见闻。文章说:“地方民众看到国军奉行三民主义的标语,同时再听到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的口号,这才是摸不着头脑。可是在共产党底作风里,也确实表现那令出必行的气势。最初他们提出减租的口号,地主底田租便不得不减轻;其次是倒租,于是他们便和地主计算要把民国二十九年以后所收的田租,取出不照共产党规定而浮收的部分完全

倒出。这一来，地主们一概破产，走得了的便逃到江南，至少也躲到城里，走不了的只有一切遵命。好在小地主都是些自耕农，只要留得几亩地，他们总还可以勉强自给。”又说：“可是共产党管不了这许多，一切只求眼前的痛快。分田以外，还有分店，这是一个在外间很少听到的名辞，但是在新四军支配的几个镇市里，已经切实执行了。分店底办法，是把店主底资本、存货和生财家具，由店员平均分配，大家一走了事。这个当然是一种极幼稚的行为。商人被打倒了，新的分配机构没有成立，那时谁来担负这营运的责任，一般的民生岂不是更加痛苦？”这是当年苏北战区的客观实录。讲真话是朱先生的行为准则，指出当时苏北农民某些幼稚行动，根本说不上“反共”。所以，朱先生从不低头认罪，不管怎么揪，就是不低头。正如朱先生在为他夫人撰写的《李方舟传》“后记”中说的：“偏偏我的颈椎不行，揪是揪下来了，不到两分钟，它又竖起来了。这实在没有办法，大约是我们家的祖先没有得到训练，所以头一低下来，用不到多久，它又昂然地竖起来了。”就在晚年经历诸多磨难之后，他毅然于八十四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行动就足以把不实的“反共”罪名给洗清了。

说到朱先生的磨难，岂止因批斗、劳改，致使身心受到折磨，家庭也因之遭殃。他的夫人邹莲舫经不住折磨，已于1968年自尽了。这对朱先生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了。那天见面，我环视朱师的狭小天地，感到凄然茫然，脱口问道：“先生就独自在这……”他叹了口气，沉吟片刻，不由自主地讲起师母的故事：“她在办食堂，每天回来都很晚。那一天，我回家，她从食堂端回一碗面条，是我的晚饭，我还没吃，一位老师上门了，说食堂关门了。她二话没说，就把我那碗面条给了这老师，然后再给我做饭。”说到这儿，朱师眨了眨眼，湿润了，突然像指责谁：“这样的好人，居然被害得……”我怕朱师太激动，会伤身体，便岔开话题：“就在这小桌上写大字？”我指着那陈旧的书桌。朱师揉了揉眼睛，指着楼梯口：“太大的字要到楼下饭桌上写。”自从师母自尽，楼下被分给别

的老师了,就剩楼上这十几平米。半年前,姚汉荣同学从上海捎来朱师为我写的一张大字,四尺宣只写碗口大刚健有力的二十八个字:

穰侯老擅关中事,长恐诸侯客子来。

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

这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写的诗,题为《偶书》。穰侯魏冉佐秦有功,封于穰,秦昭王三十六年为魏人范雎所取代,免相,出关就封。王诗借以抒发感慨,朱师似亦因以寄怀。我怕他在逆境中太消沉,急忙回了一信:“洪乔不误,法书拜领。竟以忘年相称,何以克当。喜得黄庭,愧无白鹅,聊次王诗,赧颜以答:‘泽畔楚骚吟不得,滔滔江水拍山来。须当登岱观沧海,老骥任凭野鹤猜。’言不尽意,容后面谢。”其实,朱师是很坚强的,正如刘桢诗所谓“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像乔松那样在寒风中挺立着。看到朱师的蜗居,方知为我写那张大字多不容易;同学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托我求字,已经开口了,可我心里很是不安,这不难为他了吗?但他既然答应了,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一定写。他给同学们写的字,不久即托江巨荣同学带到北京。每人赠一首七言绝句,为我书:“艰难儿女两行齐,向晚书声满小溪。为说新诗传万里,一时回首向天西。”为许德政书:“为问宝帘何日开,雅妆初试一徘徊。我庐近日无聊赖,试遣归心伺镜台。”为林冠夫书:“巴蜀飘蓬又一年,对书遥忆泪双悬。何当思妇楼头月,更逐霜风到客边。”为黄保真书:“持家作健近如何,辛苦米盐较计多。惭愧瘦单穷博士,一瓯清水剪层波。”所书绝句,均未注出处,自愧孤陋寡闻,竟不知是古人诗,抑或是朱师自作诗。因去信询问作者,1976年12月27日复信说:“所写条幅,究竟是谁的作品,竟亦不复记忆。写时如行云流水,本自无心之故。”细味四诗,极似朱师客居巴蜀所作,其《八十年》稿本云:“记得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天,我在吾庐里正在伏案

的当中,空袭警报来了。”(见其孙女朱邦薇《永久的纪念》)此之“吾庐里”,当即诗中巴蜀“我庐”。所书诗,必是蜀中寄内之作,其感念爱妻之深,溢于言表。他为学生写下这四条幅,显然是对亡妻的追悼,所谓“不复记忆”,实故作狡狴,当其下笔时,流露出来的是刻骨铭心的思念。也正因是之故,朱师决定为其夫人邹莲舫作传。

在沉痛的思念中,引发出来的不是消沉,而是坚强,这就是我敬爱的朱师。他在《八十年》稿本中写道:“一九七六年到了,这是我这八十年中最后的一年,是充满悲痛而又富于希望的一年。我的一家,亲爱的人死了,子女分散了,我抚育的孙女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去长江口的一个沙洲七八年了,还没有回来的消息。我住的房屋现在缩小到十七平方米,书籍都搁不下,有时客人来了,简直无法安身。但是我还是要工作,我希望在这仅馀的几年里,写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作品。”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文革”一结束,他便开始写《杜甫叙论》。

1978年5月底,我再次出差上海,自然要去拜访朱师。他心情很好,精神矍铄,话也多了。他说:“我祖父活了八十三,我父亲也活了八十三,如今我虚岁也八十三了,够本啦。倘能多活几年,还可以再干点事。”他留我和他一起吃中饭。“文革”结束,楼下房子又收回了,就在楼梯下饭桌上用餐。饭后,他想为我沏杯茶,转身上楼,提着一个大水瓶,从狭窄的小楼梯下来,我急忙起身去接,他挥了挥手,坚持自己提下来。他那不伏老的样子,是那样天真,又是那样倔犟,既可爱,又可敬。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浩劫”中朱师因不屈不挠而受苦的前尘。

“文革”挨批时朱师被说成“黑帮”,造反派揪他的头,朱师昂起脖子,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是在说明自己没有政治问题,而不是炫耀自己的“官衔”。早年,他曾在南京政府任过职,其时知识界的观念是这样的: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当官。他自思文才足以教书做学问,不必当三流文

人，便毅然辞官，到大学里教书去了。在唯官是尚、“官本位”风行的今天，也许不易正确理解朱师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尽责尽心的本心。1975年7月3日朱师来信说：“不才如仆，为当日弃馀之人，此曹交所谓‘食粟而已’，不能为国家尽力，为条件所限，亦姑以此自弃而已。”曹交闻人皆可为尧舜，问孟子：“食粟而已，如何则可？”孟子答曰：“亦为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朱师“自弃而已”的背后，正是“为之而已”的精神。“浩劫”过后，朱师恢复系主任职务，重新主持中文系的工作，尽责尽力，使教学走上新的轨道。他特别关心学校的改革，1978年5月10日来信说：“复旦颇有山雨欲来之势，而雷大雨小，令人气沮，想不久后，当有好转。”未曾丧失信心。同年8月13日来信说：“复旦党委，由夏征农同志来领导，到后即似锦江召集诸人略谈前后情况。闻此时各系党总支正在学习中，大政方针当可陆续公布。夏为复旦旧人，曾在中文系肄业，对于文科情况，当所稔悉。鄙意尝以为理科尚有边际可言，惟中文系则枕藉此中五十年，不敢知其高深也。”同年9月9日来信说：“校中杂事如麻，无从理起，明日仍有半日工作可做，连星期天都要奉献矣，人事之苦，有如此者。”其敬业精神可见。八十年代初，朱师改任名誉主任，1980年6月24日来信说：“系里安排人员事，想有所闻。胡先生（裕树）主持系务，徐鹏、严修担任副职，精明强干，忠厚朴实，深符人意。愚则以名誉主任名义，稍卸仔肩，极感幸意。”1981年朱师才以八十五岁高龄卸任，但仍十分关心系里的工作。1982年9月来信说：“此间诸人，郭先生（绍虞）正住华东医院，陈子展先生到五角场，跌坏了腿，此时尚在医院中。张世禄先生渐见衰惫，赵先生（景深）比前较好，但亦难于支持工作。中文系前途，唯在中青年诸位，裕树渐入老境，运熙目力亦难于坚持工作。‘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奈何，奈何！”1983年3月来信说：“此间情况，想所稔悉。系事由培恒、徐鹏诸兄负责，但确实极为辛苦。允吉兄极努力，亦有成效。中文系确不易办，可能别系也是如此。愚则一两年来，日见衰颓，好在亦置之度外，不多厝意也。”说是“不多厝意”，其实十



师友琅琊行馆

分关心。他关心的是中文系的前途，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文学事业。1985年10月12日来信说：“今年住医院二三个月，目前仍须经常服药，大约未必能完全复原，九十得此，原在意中，亦不足较。颇有在三年内写成一传记之意念，未知能否得此长假。倘能完成，大约可以安心交卷矣。”九十岁还订三年规划，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朱师卸任后，于1982年开始写《陈子龙大传》（即《陈子龙及其时代》），1986年接着写《元好问传》，真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其为道也，求正而诚；其为学也，求精而深，这个原则成了朱东润先生的人生轨迹。

写“真”与写“活”

“文革”后，听说朱师写成《杜甫叙论》，我即为人文社写信约稿，他答应了。可1978年我在朱师的师友琅琊行馆向他要稿子，他却不肯将稿子交给我，只让我带回六十年代初约定的《梅尧臣诗

选》手稿。1978年8月13日朱师来信说：“《梅尧臣诗选》能于九月间发稿，极好。待清样寄到时，如有便人来沪，即可持《杜甫叙论》北去，息壤犹在，谅不至疑其食言也。”以息壤之盟为言，似乎严重了，但正可见朱师为人之诚信。同年9月9日又来信说：“《杜甫叙论》，一切均如上次所决定者。月内即行重看一遍，一俟有人带‘梅选’清样来，即凭来信交出。尽管此中并无特长可言，但亦是经年苦思所得，不愿即付邮寄去，因挂号信件，万一遗失，彼时即如哑子梦见妈，有苦说不出也。”朱师一再强调以“梅选”清样换取《杜甫叙论》稿子，似乎是因为对人文社不够信任，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当时我从《梅尧臣诗选》书稿档案获悉，“梅选”系人文社所约之稿，1964年年底交稿，即被搁置下来。1965年6月，朱师致信古典部负责人王士菁先生，询问审稿情况；1966年1月再次致信古典部，了解“梅选”进展情况，并说：“又拙稿《梅尧臣传》，曾因王士菁同志一再函询，前曾言及，此时既未闻王士菁同志回京消息，即不必提矣。”由于“梅选”之稿在人文社压了十年之久（其中有“文革”原因），朱师因将其《梅尧臣传》转到中华书局，也以此不轻易交出《杜甫叙论》，从这里可以看出，出版社和作者之间信守合约的重要性。直到1980年4月间，人文社才将“梅选”清样寄出，并取得《杜甫叙论》手稿。当年5月中，《文学遗产》高光起先生手持朱师给我的信函，云：“兹有一事奉商者，《文学遗产》来函言及要用‘杜论’最后一章，列举种种理由，言与尊处无碍，等等。究竟如何，我亦无从悬揣。如确实无碍，请与贵室领导同志商定，是否可行，以免《文学遗产》诸公踌躇如何？”经编辑室商定，同意高先生取走“叙论”末章“此曲哀悲何时终”，于该书出版前刊登。有鉴于“梅选”的遭际，我丝毫不敢怠慢，抓紧审读，当年即发稿，于翌年三月出版。两年后重印，并加印若干精装本。我还写了一篇五千来字的评介文章，登在《读书》杂志上（1984年第一期）。这一切，都使朱师颇感满意。朱师之于此作，也颇为得意，其得意之处，在于书中提出了杜诗创作的两个高峰。1985年5月1日来信说：“《杜甫叙论》能在最近